

山东大学韩国学院
韩国研究丛书

金哲 著

20世纪上半期 中朝现代文学关系研究

20세기상반기 중조현대문학관계 연구

山东大学出版社

山东大学韩国学院
韩国研究丛书

金荷 著

20세기상반기 중조현대문학관계 연구

20世纪上半期 中朝现代文学关系研究

20세기상반기 중조현대문학관계 연구

20세기상반기 중조현대문학관계 연구

20세기상반기 중조현대문학관계 연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上半期中朝现代文学关系研究/金哲著.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4
ISBN 978-7-5607-4740-8

I. ①2…

II. ①金…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②现代文学—文学研
究—朝鲜

IV. ①I206.6 ②I3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5979 号

策划编辑:赵 岩

责任编辑:赵 岩 徐琳琳

封面设计:牛 钧

出版发行: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 编 250100

电 话 市场部(0531)88364466

经 销: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 刷:山东华鑫天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规 格:720 毫米×1000 毫米 1/16

16.75 印张 247 千字

版 次:201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序 言

同处于汉文化圈的中朝^①两国，素来有着频繁密切的文化文学交流。但古代的交流，是占绝对优势的优秀中国文化单方面地流入朝鲜半岛的不均衡的交流。这种现象，直到近代才逐渐得以改变。在西方文化的强劲势头面前，两国文学都经历了无数次的彷徨和困惑，最终各自找到了适合本民族文学发展的方向。

自20世纪初起，中朝两国的文学均进入了转型时期。两国在探寻

^① 在此，笔者首先需要对本书涉及的“朝鲜”及相关概念加以说明。

现在，朝鲜半岛上存在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8年9月）和大韩民国（成立于1948年8月）两个政权。此前的1910～1948年，是朝鲜半岛历史上一段非常复杂的时期。1910年8月22日，日本伊藤博文政府迫使大韩帝国政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设立了“朝鲜总督府”。此后，朝鲜半岛经历了36年的日本殖民统治。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朝鲜半岛宣布“解放”，这一事件被称为“8·15光复”。

但是，光复之后的朝鲜半岛并没有立即实现独立，而是根据同盟国协议，以北纬38°线为界作为美、苏两国军队分别受领在朝鲜半岛上的日军的投降事宜和对日开展军事活动的临时分界线，以北为驻朝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即日本投降后，美、苏军队分别进驻三八线南北地区。“美军政厅”实际成为1945年9月至1948年8月这个时期朝鲜半岛南部的支配者，现在韩国一般把这段时期称作“美军政时期”（个别文学、史书上称之为“解放空间期”）。朝鲜半岛北部则成立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积极准备建立新政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宣布建立后，苏、美军队分别撤出了朝鲜半岛。那么，1910～1948年朝鲜半岛的历史，可以分为日本殖民地时代（1910年8月至1945年8月）和苏美占领时期（1945年9月至1948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建立止）两个阶段。

在本书中，为了叙述上的便利，笔者把日本殖民地时代和苏美占领时期的朝鲜半岛统称为“朝鲜”。为了相区别，在使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时，加以特别注明。

本书书名采用“朝鲜”这一概念时，其意义是指1910～1948年这个历史时期的朝鲜半岛。

在本书的文献引证标注中，凡是涉及1910～1948年这一历史时期朝鲜半岛的作者、报纸、杂志、出版社等，因为引用时已经明确了时间，均不再标注国名。涉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的，分别标注为[朝]、[韩]。

本国文学发展方向的过程中,均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与文学,且同时以周边国家及其他民族的文学为“他山之石”,不断取长补短。由于与中国文化间的悠久历史渊源,这一时期的朝鲜,在积极接受西方文化与文学的同时,也从中国现代文学中汲取了不少的养分。中国现代文学无疑对朝鲜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该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坛并没有对朝鲜文坛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有些人仅仅是以对弱小民族的同情来关注部分朝鲜现代文学。这与中国现代文学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是无法相比的。当然,这一时期两国间的交流是一种平等的交流。虽然,此时的交流并不是很频繁,却蕴含着试图理解彼此文学的努力。因此,两国的现代文学才能够更加丰富多彩。笔者认为,中朝现代文学交流的意义也在于此。

遗憾的是,有关中朝现代文学的这种交流却一直不为两国读者所知。特别是中国读者,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理解。即使有些中国读者想了解中朝现代文学的交流情况,也很难查阅到相关的图书及资料。因此,编写让中国读者易懂的有关中朝现代文学关系的书籍,正是时代需要,这也是笔者写作此书的初衷。

本书以20世纪上半期为时间范畴,以中朝两国的主要翻译家与作家为中心,按时代类别分别叙述了中朝现代文学的关联情况。但由于这部分内容并非本人的专业研究领域,本人对其知之甚少,只是几年前在讲授过程中,偶然接触到相关内容,并最终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这样,我从最初以兴趣为始的学习,到一篇篇论文的积累,并在学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原始资料,最终能够编辑成册,使本书得以问世。

笔者最初的计划是编写《中朝文学交流史》(近现代),但因笔者个人的原因,中途变更计划,最终形成了这本《20世纪上半期中朝现代文学关系研究》。因此,该书的叙述角度及整个体系都有了不少的变化。加之笔者水平有限,难免有不足之处。望各位方家、学友不吝赐教。

在此,真心希望该书能够为广大读者了解及理解中朝现代文学提供些许帮助。笔者将会把此书的出版视为今后研究中朝现代文学交流史的新契机,继续努力。

作者

2012年8月23日于山东威海

目 录

20 世纪上半期中朝现代文学关系述评

——以 1910~1950 年的文学交流为中心	(1)
开创与中国现代文人交流先河的朝鲜文人——玄哲	(52)
胡适与 20 世纪上半期的朝鲜现代文坛	(61)
鲁迅与 20 世纪上半期的朝鲜现代文坛	(84)
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者——梁白华	(125)
李陆史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与接受	(140)
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者——丁来东	
——以 20 世纪 50 年代之前为中心	(154)
金光洲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与译介	(174)
浅谈金光洲中国背景小说创作	
——20 世纪上半期以中国为背景的短篇小说	(188)
巴金的文学创作与“阿里郎”民族	(201)
李明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译介	(224)
尹永春与中国现代文学	(239)

20 世纪上半期中朝现代文学关系述评

——以 1910~1950 年的文学交流为中心

近代以来,中朝文学交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主要特征是从之前的单方面输出和接受的交流模式转变为双方的双向输出和接受的交流模式,这可以称作是一种划时代的变化。

就朝鲜而言,由于通过日本传入了大量的西方文化,所以,朝鲜文化对传统意义上关系密切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产生了逐渐疏远的倾向。进入 20 世纪初,朝鲜文坛意识到自身发展的必要性,同时也开始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方向。从这一时期,朝鲜文坛开始加强了与世界文学的交流,并积极引进外国文学,出现了引进以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为中心的西方文学的热潮,随之逐渐忽略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也没有意识到中国文坛同样经历着与之相似的变化。从某一方面来看,朝鲜文坛是想从传统强势文化的束缚中脱离出来,但从传统意义上看,几千年来,中国和朝鲜同属于汉文化圈,已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到了近代,这种影响关系虽然比以前减弱了不少,但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断绝。因此,在大家都热衷于引入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的时候,也有不少文人学者在关注邻国——中国的新文学和现代文学。

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之后,经过转型期的朝鲜文学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关注中国新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学者及研究者的不断出现,艰难延续下来的中朝文学交流也重新开始活跃起来。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朝文学交流达到了高潮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时期,有不少的中国文学作家和作品被介绍到朝鲜,同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评论也非常活跃,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热潮。

但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军国主义者对朝鲜的统治空前强化,朝鲜文坛的活动也逐渐进入了停滞时期。在如此恶劣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译介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8·15光复”^①之后,朝鲜再次掀起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潮,在解放期这一既复杂又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和翻译介绍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但之后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朝鲜半岛的分裂,维持四十多年的中朝近现代文学交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持着较密切的文化与文学的交流关系,而与南朝鲜^②几近没有此方面的交流。

总体来看,20世纪上半期,中朝两国现代文学交流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解放空间期(1945.8~1948.9)^③恶劣的社会背景下,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和观念上的差异,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作品及评论文章相对较少,并存在翻译水平和评论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对此,我们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

就中国文坛而言,对朝鲜现代文化乃至文学的关注是从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朝鲜既是弱小民族国家,又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的友好邻邦。中国以同情并试图接近已经疏远的邻国文学的立场,开始探索朝鲜文学。但由于翻译人才和研究者的匮乏以及受到传统事大主义^④的影响,中国对朝鲜现代文坛的态度非常消极,既不关注也不作评价。

① “8·15光复”是指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朝鲜半岛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获得解放。

② 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进一步加剧了朝鲜半岛的分裂。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很长一段时期里,中国不承认大韩民国,而是称之为“南朝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8月中韩两国建交。本书中出现的“南朝鲜”,指的就是中韩建交以前我国对韩国的称谓。

③ 这个时期一般是指从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至1948年8月大韩民国成立,约3年的时间。

④ “事大”一词出自《孟子》中的“以小事大”,后来在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如五代十国时期)常出现于较弱小国家对较强大国家的外交文书中,后来被引入朝鲜。事大主义是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和政策,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事大主义的形成与传统的华夷秩序有密切的关系,特指1392~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朝称臣纳贡、积极效仿的政策。“事大”成为朝鲜对华政策的代名词。[参见孙卫国:《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大约进入 20 世纪 30 年代之后,中国才开始引进朝鲜现代文学,但介绍朝鲜现代文学以及文坛情况的文章和翻译著作在数量上还是非常少的。当然也有一些评论,但也不过是几篇而已。与朝鲜现代文坛相比,中国在翻译家、作家、研究者的参与规模、对朝鲜现代文学的关注程度以及翻译著作的内容和范围等方面差别很大。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朝鲜现代文学译介成果在研究中朝两国现代文学交流史上,依然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朝两国在诸多领域都有着同质的文化。这种同质文化以及文学,无论是对中国还是朝鲜,都是宝贵的遗产,也是今后两国关系能够更加健康发展的基础。因此,对于 20 世纪前半期,由于错误判断而被忽略的中朝文学关系,应重新澄清。同时,也应对中朝现代文学关系树立新的认识。^①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中朝现代文学交流所取得的成果和获得的经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无数的人类交流史已证明,无论何时,交流都是双向的。以这种标准来看,中朝文化、文学交流应属于双向交流。但由于特殊的文化地缘关系,中朝古代文化、文学交流是不平衡的交流,这种交流上的不平衡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也可以说延续到当代)。近现代文学交流在某些方面也存在不平衡的现象。当然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原因,这种特殊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在同属于东亚汉文化圈的中朝两国致力于交流合作及共同发展的时代潮流下,这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曲折。但这一时期的中朝现代文学交流在整个文学交流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应给予全面、客观的考察和评价,这样才能使跨入 21 世纪的中朝现代文学关系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

本文立足于比较文学的接受及影响的研究方法,将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在朝鲜的传播、接受情况及朝鲜现代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接受情况进行探讨,为广大读者理解这一时期不平凡的中朝近现代文学交流史,提供一种客观的视角和观点以及具体、翔实、有价值的资料。

^① 参见金英今:《近代转换期的韩国文人梁建植与中国文学》,载李龙海:《韩国学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329 页。

一、朝鲜现代文坛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

本章将主要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在朝鲜文坛的传播过程、朝鲜现代文坛对中国近代文学的态度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情况进行探讨。

(一) 朝鲜现代文坛以及朝鲜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态度

20世纪50年代以前,朝鲜文坛及学者们对引进中国现代文学的态度究竟如何,可以从这个时期的文坛以及当时学者们的一些观点中找到答案。序言中已提过,朝鲜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正式引进外国文学。不管是哪个国家,在外国文学的引进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都是扮演接受者、传播者角色的翻译家。在朝鲜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有不少的翻译家、文人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都意味深长地强调:“在文化的世界性交流时代,与外国文学的接触和交涉对本国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①特别是,有些朝鲜的翻译家、文人从很早开始就强调,要关注包括对中国新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的译介。

我们先从20世纪20年代朝鲜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翻译家——梁白华的观点来进行探讨。梁白华(1889~1944)原名梁建植,是这一时期在对新文学的翻译、介绍中表现最积极且成果最多的翻译家、作家之一。他一直都把研究中国文学作为自己人生的一部分,将自己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了中国文学的探究、翻译和介绍中。他十分关注并热爱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积极拥护新文化运动,曾在日本中文学者的论文译文——《中国的思想革命与文化革命》中讲过:“从某个方面看,中国和朝鲜的情况比较相似。”^②所以,“为了能对朝鲜人起到暗示作用而翻译这篇文章”^③,以此表明了他对当时新生的朝鲜现代文坛的关心和

① 崔圭弘:《翻译文学的树立》,载1934年5月14日《朝鲜中央日报》。

② 梁白华:《中国的思想革命与文化革命》,载1922年8月22日至9月4日《东亚日报》。

③ 金英今:《近代转换期的韩国文人梁建植与中国文学》,载李龙海:《韩国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页。

期待。另外,梁白华在翻译、介绍胡适的《新诗坛》时,也曾说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胡适提倡文学革命和白话诗的动机及其主张,而且给了我们朝鲜诗坛一个有力的警示性参考。”^①表明了自己翻译胡适文章的理由和意义。

总之,梁白华是为了朝鲜民众的觉醒和朝鲜文学的发展而翻译中国新文学作品的。如上所说,中国新文学在他的心目中占据很大的比重。从这种目的和态度中,我们可以看出,梁白华是以一种肯定的态度来研究、介绍中国新文学的。

20世纪30年代,积极推动和引进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著名中国文学研究者——丁来东也是如此,他反复强调了引进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早在1935年8月,丁来东分4次在《东亚日报》上发表了《文坛整理与外国文学引进之必要》一文,指出了翻译外国文学的重要性,强调了朝鲜文坛改变旧观念和态度,积极引进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新文学(近代文学)的重要性的必要性。文中这样讲道:

中国文学的社会背景与朝鲜文学十分相似。所以,要互相学习的地方也很多。但中国文学中,一些不好的因素也影响到了朝鲜文学,导致有些人忽略中国文学并认为中国文学是没有任何价值的。然而,随着欧美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增热和日译中国文学的逐渐兴起,此前的认识才有所改观。但憎恶汉文文学的倾向依然存在。但我认为我们必要抛弃旧见,从科学的角度来认识并引入中国的新旧文学。^②

这不仅强调了引进中国文学的重要性,而且还提出了要改变重视西方文学而贬低中国文学的旧习。总之,丁来东在此文中,以非常积极、客观、诚恳的态度指出了朝鲜文化引进外国文学的必要性,并特别强调了朝鲜文坛翻译、引进包括中国现代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的重要性。之后,洪晓民、金光洲、尹永春等人也通过各种文章强调了引入中

① 这是1919年10月,梁白华对胡适《谈新诗》的部分翻译。

② 丁来东:《文坛整理与外国文学引进之必要》,载1935年8月7日《东亚日报》。

国现代文学对本国文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并不断地翻译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向朝鲜介绍了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坛的一些状况。

朝鲜小说家、评论家洪晓民曾在1947年的《中国文学和朝鲜文学——其相关性的粗略考察》一文中谈到:“到目前为止,朝鲜文坛对中国文学的关注太少了。36年的日本殖民统治深深影响了朝鲜文坛,使其远离了原本最亲近的邻国(指中国)文学(革命文学)。当读到通过日文转译的外国文学后,我们觉得特别了不起,为了消化和宣扬这种文学,不知道花费了多少心思……应该像关注外国文学那样关注中国文学……”^①他还强调,在中国文坛有着像郭沫若、朱自清、徐志摩、冰心、老舍等很多世界性的著名作家,并主张朝鲜文坛也要关注中国文坛,把中国文坛作为研究对象。现存的资料显示,当时在朝鲜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和作家普遍持上述的观点和见解。

金光洲也是持这种观点的朝鲜现代作家、翻译家之一。金光洲已发表过《华北文坛的展望》、《文艺与宣传——中国文坛理论介绍的一步路》、《关于中国文坛现实的一瞥》(1~4)、《中国女流作家论》、《鲁迅和他的作品》等很多评论和翻译文章。通过这些文章,我们可以详细地了解金光洲对当时中国现代文坛的关注程度,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他为当时的文坛注入新活力所作出的努力和良苦用心。

曾活跃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界的朝鲜文人尹永春也对此作出了比较中肯的判断和评论。他曾在1948年《白民》第14号上发表《外国文学引入一考——主要论中国文学》一文,虽然文章不过3000字,但作者在文章中比较客观、全面地阐述了有关吸收、借鉴外国文学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所持的态度,并明确指出,在翻译介绍工作中的具体操作以及将来需要培养中国文学翻译人才的重要性。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尹永春重点阐述了有关中国新文学的吸收及接受态度的观点。他指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由于日本殖民统治及文化专制的影响,忽视了近邻中国新文学的重要性,从而导致缺乏文学发展所必

^① 洪晓民:《中国文学和朝鲜文学——其相关性的粗略考察》,载1947年8月10日《京乡新闻》。

要的养分。”^①这些言论恰好对这个时期朝鲜现代文坛普遍忽略中国现代文学的倾向敲响了警钟。

与尹永春同时期的翻译家宋志英同样曾在《战后的世界文化思潮——激烈的文学运动——中国篇》中明确地强调过：“要走向真正的文学之路，应该深刻认识到作为外国文学的中国文学的必要性。同时，要关心学习中国文学的年轻人，为他们提供合适的学习环境，这是我们的当务之急。”^②这一切都表明，当时朝鲜文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真诚关注和关心。

从以上的考察看，20世纪上半期，不少朝鲜现代知识分子对邻国中国的新文学乃至现代文学都持有新的认识和理解。他们十分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均认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和研究，将会有助于朝鲜现代文学的建设与发展。但朝鲜文坛确实仍存在只重视西方文化及文学，贬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象。这是当时朝鲜知识分子在外国文化认识和引进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认识上的局限性。

（二）中国现代文学的传播媒体、传播者和传播过程

朝鲜“三一”运动后，中国现代文学开始逐渐传入朝鲜。当时，朝鲜的近现代翻译家、学者、作家们在中朝现代文学的交流过程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研究者们虽然曾为朝鲜现代文学的自身发展而苦恼过，但也探索出了新的发展路子。当大部分学者追随西方文学的时候，另一部分翻译家、文学研究者却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现代文坛，并对中国现代文学持肯定的态度。他们在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同时也进行积极探究，以一种收为己用的态度，不断把中国现代文学译介并传播到国内文坛。如果没有这些翻译家、研究者深远的眼光和深切的关注及努力，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可能以如此规模被介绍到朝鲜。

另外，在中国现代文学在朝鲜文坛的传播过程中，杂志和新闻等媒体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日本强行合并朝鲜之后，考虑到朝鲜民众的反抗情绪，在文化层面上，从初期高压政策转为标榜迂回的

① 尹永春：《外国文学引入——主要论中国文学》，载《白民》1948年第14号。

② 宋志英：《战后的世界文化思潮——激烈的文学运动——中国篇》，载1948年9月5日《京乡新闻》。

文化政策。同时,允许朝鲜民众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自由地选择和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在这种“宽容”的殖民文化政策环境下,新闻、杂志等朝鲜现代媒体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这些同样对中国现代文学在朝鲜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当时社会政治文化的变化,上述的状况有时处于活跃的高潮,有时也处于低潮,每个时期有着不同的特征。但从整体来看,中国现代文学在朝鲜的传播一直没有中断过,呈现出曲折性发展的特征。

1. 中国现代文学传播中的媒体

在介绍和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的过程中,最早、最领先的杂志是《开辟》。这本杂志从梁白华的《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①开始,登载了多篇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文章,介绍和传播中国现代文学。此后,有四五十种杂志、报纸先后刊载了数百篇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翻译作品(包括诗、小说、剧本)、评论文章以及研究论文,为中国现代文学在朝鲜的译介、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报纸有《独立新闻》、《京乡新闻》、《东亚日报》、《朝鲜日报》、《每日申报》、《东明》、《时代日报》、《中外日报》、《朝鲜中央日报》^②、《汉城日报》、《朝鲜周报》、《自由新闻》、《文化日报》、《国都新闻》等;杂志有《妇人》、《新民》、《东光》、《现代评论》、《白民》、《朝鲜文坛》、《中央新闻》、《三千里》、《彗星》、《新东亚》、《新天地》、《第一线》、《文艺月刊》、《文章》、《东方评论》、《学灯》、《文学》、《新家庭》、《诗苑》、《人文评论》、《春秋》、《国民文学》、《大潮》、《象牙塔》、《朝光》、《新人文学》、《协同》、《新文学》、《月刊艺术通讯》、《文化日报》、《新韩民报》、《民声》、《大潮》、《艺术》等。

通过这些媒体,朝鲜文坛和读者接触到了许多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信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也有了客观、全面的认识。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媒体的重要性。在当时众多的报纸、杂志中,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朝鲜日报》、《每日申报》、《东亚日报》和《开辟》等。

① 这篇文章原来是1920年9月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青木正儿在名为《支那学》的杂志上发表的,原题目是《以胡适为中心波动的文学革命》,梁白华翻译,并在1920年11月到1921年2月韩国《开辟》杂志上翻译、刊登时,改成了《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

② 《朝鲜中央日报》的前身是《中央日报》(1933年3月至1937年)。

2. 中国现代文学传播中的领军人——翻译家、研究者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在朝鲜的传播过程中,有许多朝鲜的翻译家、作家、研究评论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最先接触早期中国新文学的作家、翻译家是梁白华,他于1920年11月在《开辟》杂志上最早发表了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文章,并因此受到了朝鲜文坛的关注。梁白华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石狮子像》、《悟!》、《迷之梦》、《悲伤的矛盾》等,在朝鲜近代文学史上颇负盛名。但此后,除小说创作外,梁白华更致力于对中国新文学的翻译及介绍。梁白华于20世纪初,在中国留学近十年。^①

除此之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介绍与评价方面,也出现了很多表现活跃的研究者、评论家及作家。其中,20世纪20~40年代,活跃在朝鲜文学研究界的以丁来东、金台俊(笔名天台山人)、李明善、金光洲、尹永春等最为突出。当时,创作与中国现代文学有关的文章或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学者、研究者有二三十人。例如,朴鲁哲、李达、李殷相、李庆孙、朱耀翰、朴胜极、李陆史、宋志英、洪晓民、裴滹、韩雪野、李一山、李东熙、崔章学、牧洋(原名李石熏)、卢春成、卢子咏、白铁、李何有、赵超构等。他们主要发表了与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评论或一般介绍性的翻译文章,虽然根据个人情况,翻译介绍的数量或多或少,但均为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付出了诸多心血和代价。在作品翻译中,梁白华、柳树人、李殷相、郑重心、金光洲、丁来东、李陆史、裴滹、尹石樵、崔章学、洪亨义、尹永春、安钟和、李荣雨、Y生(笔名)、汉仁(笔名)、韩雪野等翻译家的表现比较突出,但最为活跃的是梁白华、丁来东、金光洲、李陆史等。他们都是有中国留学经历或在中国生活过的文人、作家和翻译家。这种经历对于他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介绍中国现代文学,有很大的帮助。除此之外,20世纪40年代的郭文秀、朴志贤、吴悬秀、崔正建等在介绍中国现代文坛状况或作家方面,也作出了较突出的贡献。

总之,就因为以上这些翻译家、学者、作家的辛勤工作及不断的努

^① 参见金英今:《近代转换期的韩国文人梁建植与中国文学》,载李海龙:《韩国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333页。

力,才使中国现代文坛的新趋势和作家、作品在朝鲜文坛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介绍。同时,朝鲜文坛和读者也能够客观地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状况。这样的交流,无疑为朝鲜现代文学的发展及中朝两国现代文学的共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3. 被介绍到朝鲜文坛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及翻译作品

无数的朝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评论家、作家、翻译家通过自己的辛勤努力,在朝鲜文坛翻译和介绍了许多中国现代文坛的作家、作品以及评论文章。部分研究证实,1920~1929年,在朝鲜被介绍过的中国近现代文学作家共有三十多名,其中有梁启超、谭嗣同、林纾、曾朴、章士钊、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刘复、苏曼殊(即苏玄瑛)等近现代作家、文人。^①但由于研究范围的界定关系,这里只重点探讨现代文人、作家及其作品。

首先,大体了解一下曾被介绍到朝鲜文坛的现代文人和作家。

在这个时期,没有对个别的作家进行专门的介绍,而主要是将其穿插在中国现代文学状况的介绍中进行概括性的介绍,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中国现代文坛上有名的作家基本都在被介绍的范围之内,其中最先介绍到朝鲜文坛的现代作家是胡适,有关胡适和他的文章的介绍就达5篇。梁白华在翻译的《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一文中,对于胡适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取得的辉煌业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胡适不仅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史上,还在朝鲜的新文学运动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继胡适之后,鲁迅也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鲁迅一度与朝鲜现代文人有着很深的交往,他以卓越的文学成就及高尚的人格,在朝鲜文坛拥有很高的威望,是朝鲜文人最尊敬和崇拜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正因如此,在当时发表的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及与作家相关的文章中,谈到鲁迅及其作品的文章最多。鲁迅最初在1921年2月被朝鲜人所了解,此后,介绍鲁迅及其作品的文章层出不穷。并且,对他的评价也很高。朝鲜著名诗人、作家李陆史在早期将鲁迅称为“现代中国文学之父”、“伟

^① 参见尹允镇:《中国新文学的东进序曲(1917~1929)——中国新文学对朝鲜的文学性影响》,载《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2期。

大的文豪”、“中国文坛的马克西姆·高尔基”、“文化战士”、“伟大的中国文学家”。此外，郭沫若和欧阳予倩也被介绍到朝鲜，对周作人的介绍也不少，其次是蒋光慈、丁玲、巴金、茅盾、徐志摩等。

除了在上面提过的主要作家之外，曾在各种文章中提到过的作家还有一百多名：林语堂、梁实秋、钱玄同、庐隐、曹雨、艾青、冰心（原名谢婉莹）、白薇、易沙白、沈从文、田汉、欧阳予倩、毛一波、刘大杰、朱希祖、朱自清、俞平伯、成方吾、朱湘、郑振铎、汪静之、俞上沅、郑伯奇、宋春航、钱钟书、宗白华、刘延陵、闻一多、刘大白、徐玉诺、吴昊、古丁、沈尹默、康白情、老舍、吴芳吉、田寿昌、杨振声、郁达夫、凌叔华、许钦文、何心冷、陈大悲、冯叔鸾、冯沅君（后改名淑兰，笔名淦、沅君、易安、大琦、吴仪等）、叶绍钧、南庶熙、蒲伯英、冯文炳、吴镜心、杨振声、熊佛西、王独清、刘半农、穆木天、许钦文、丁西林、向培良、张资平、萧军、王连正、章衣萍、冯乃超、孟超、徐迟、雷蒙、端木蕻良、张天翼、供荣、孙席珍、蒲牢、耶林、白薇（原名黄彰、黄鹂）、适夷（原名楼适夷）、李辉英、丁玲、史铁儿（瞿秋白）、黑炎、葛琴、文君（原名杨之华）、傅斯年、沙汀、智珠（原名郭秉慧）、陈衡哲、石评梅、苏雪林（笔名绿漪）、CF（原名张近芬）、露丝（原名林锡棠）、露明（原名赵景深）、秋瑾、陈学昭、吴曙天、沉樱、梅汀、胡也频、汪静之、袁昌英、汴沁、逸霁、王鲁彦、穆时英、余上沅等。

朝鲜文坛对中国现代女流作家也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和介绍，前后有丁来东的《中国女流作家》^①、《中国女流作家的创作论和创作经验谈》和金光洲的翻译文章《贺玉波原著〈中国女流作家论〉》（1934）^②、李达的《现代中国文坛的十大女流作家论》（1~4）^③、朴胜极的《论中国现代女流作家——丁玲》^④以及《活跃的中国尖端女性》（1~5）^⑤等文章，

① 丁来东的《中国女流作家》有2篇，均发表于《新家庭》，但其发表时间和内容各不相同。

② 这篇翻译文章的底本是中国著名批评家贺玉波的原著《中国女流作家》。本篇翻译文章的初版时间是1932年，上海复兴书局于1936年第1次再版。贺玉波，原名贺家春，笔名白露、兰城，他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在上海文坛上的翻译家、作家、评论家、学者。金光洲将其翻译并发表于《东亚日报》（1934年2月24~28日、3月1~30日）。

③ 载1935年1月17~19日《朝鲜日报》。

④ 载《朝鲜文坛》1935年第4卷第3号。

⑤ 载1930年12月1~5日《东亚日报》。